

雙重的房間

阮慶岳

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兼系主任

關於建築的興建與荒廢，有如出生與死亡，本來是互補共生的兩件事，卻常常因為人們只關注其中新生的一面，刻意忽視死亡的存在面向，而使事實的整體面，會出現一種傾圮不平衡的奇異現象。

建築與城市如此，人生許多其他面向也是如此。

新建築、新人與出生，能帶給人興奮的感覺，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；而廢墟、舊人與死亡，要如何能以同樣平等心去看待，就不是那麼容易了。歷史中懂得將這陰暗面向作為創作題材的創作者，當然遠不如另個面向多，但是細想來也不是那麼少，例如16世紀的比利時畫家波西（Hieronymus Bosch）、唐詩人李賀、波特萊爾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芥川龍之介等。

然而，他們在這種死寂的面向裡，究竟見到了什麼呢？

波特萊爾在題名「雙重的房間」散文詩裡，這樣寫道：

不，不再有分，不再有秒！時間消失了；是永恆在統治，幸福之永恆！

但是門上發出了一下可怕的，沈重的敲擊聲。一如在惡夢中，我像是被人用鶴嘴鋤在胃上打了一下。

然後一個幽靈進來了。

應該是一種在初生現象裡所見不到、只能藉著死寂而得感知的永恆性。也因為時間感的消失，賦予了空間某種難以描述地恆久力量，是那種在嬰兒臉上見不到、只能在老人臉上見到的生命重量。

而且，初生的真正喜悅，本是必須藉死亡的重量，才得彰顯。

現代建築在追逐新、奇與興奮感上，完全不落人後，而相對在思考時間的永恆、死亡的意義

上，就顯得輕率、逃避與無力應對。我們的建築與城市，本來應該當如所有的森林一樣，生生不息、並且生死更易（生即是死、死即是生）。因此，當我們在面對都市裡的新生創造時，也該要同時懂得怎樣看待城市的衰老與死亡。

西方上世紀以理性與控管做出發的都市規劃內容與觀念，現今已顯露缺乏彈性所衍生出來的都市僵化問題，許多老舊的市區與建築，因無法轉型利用而面臨急速蕭條的命運。亞洲城市在這樣的過程裡，由於學習這套都市規劃法則的時間較晚（以及較無效律），因禍得福地，反而維持著一種無政府狀態的靈活個性，使得城市依舊有著類如自然森林的有機（而非人工花園的強硬規劃修剪）生長性，例如我們依舊四處可見的夜市、攤販與違章建築。

關於這樣的有機生長性，本來是極度值得珍惜的都市個性，也能以正面態度去思考與面對，但我們的政府管理者（與受其教育影響的民眾）在面對這樣的都市現象時，卻反而露出畏怯與迴避的態度，似乎覺得不可控制就是可怕的問題。

評論家鍾喬曾以我所策展的「朗讀違章」為文（發表於中國時報的言論廣場），提到這種態度的背後與「現代性」之間的糾結關係：「『違章』一般被視為是非法的、欠缺合理基礎的建築，因而理當被公權力的『怪手』給剷除。然而，就如攤販雖為非正式部門的經濟行為，卻在臺灣蔚為一種文化現象，且成為都市民間社會活力的資源一般，『違章』背後所折射出來的社會、文化意涵，亟待澄清。」

鍾喬藉由謝英俊在展覽中的作品，指出這樣的空間中「出現了另一種搖搖晃晃的不安全感。這種不安，追根究底，就是亞洲對於落後記憶的不安，也可以說，它就是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。」

這種「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」確實是使台灣在發展自體建築美學時，顯露出躊躇不安的原因。因為，這種所謂的「第三世界性」在面對以西方為首的「現代性」時，往往會驚懼於對方顯現的巨大、科技、單一、大系統與理性秩序觀，因而對自身所具有的微型、雜亂與低科技的現實，心生不安且難以正視。

日本前輩建築師蘆原義信的《隱藏的秩序》（1989），對此觀點提出正面挑戰，意圖重新思考亞洲現代城市的自體價值究竟何在。蘆原義信以東京為例，寫著：「在東京這種混合的現代感當中，我們可以感覺到屬於日本特有的民族特質，這是一種生存競爭的能力、適應的能力、以及某種曖昧弔詭的特質，渺小與巨大的共存、隱藏與外露的共生等等，這是在西方秩序中找不到的東西。」

他特別強調了居住者的生存、競爭、適應、共存、共生等本能需求的價值，並給予這些底層的現實高度評價，也點出亞洲城市「由下而上」的隱藏性內在特質，與西方現代城市強調「由上而下」的外在表象是大不相同的。

蘆原義信對於何謂城市的秩序提出再思，尤其對亞洲城市的自我位置是十分有趣的觀點，他寫道：「東京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雜亂，整座城市給人的感覺就是不統一，以及建築物的不協調……建築物表現出來的是無秩序、沒有一致性、缺乏傳統的外表。」

蘆原義信逆勢地提出了東京（也是許多亞洲都市的現況）是以真實內在需求為其秩序準則，而非西方所一貫強調以視覺及控管為準的外在秩序。他相信這種差異乃是源自東西方文化，在追求內在與外在的秩序觀上，本就有其本質的思想差異。蘆原義信認為東方的城市並非無秩序，只是並非西方外顯式的都市秩序，事實上，仍有著其獨特「隱藏的秩序」在內裡做操控與調整。

在此價值觀的思索中，也能見到日本中生代建築師塚本由晴的積極回應。經過幾年走遍東京大街小巷後，塚本由晴與另一位作者一起寫出來《東京製造》（2007），探問自己，東京的現代建築究竟是什麼？為什麼他們每天見到的東京建築，與雜誌上刊登的那些時尚美麗的東京建築，居然完全不同。

塚本由晴所描述的東京，某個程度上與台灣城市的經驗很類似：「國外旅行後，特別是從歐洲回到東京時，總會為巨大的不協調感所震驚：建築物上有電車或道路穿梭；高速公路蜿蜒地跨在河川上空；車子可以開上直達大樓六樓屋頂的斜坡；而住宅區中的高爾夫球練習場，看起來就像個大籠子一樣。」

塚本由晴在看到這樣令他瞠目結舌的都市現象後，開始思考究竟該向東京已經存在的「醜惡」現實建築學習，還是該繼續向歐美的「美麗」現代性神話學習？塚本由晴最後毅然揮別那個遠方的神明，並擁抱讓他覺得似乎有著「無恥感」的現實東京，他說：「吸引我們的，並非建築上的構成美學或形式，而是以直覺對應周遭環境與內容為優先目標的建物。我們以著夾雜著愛與輕蔑的感情，稱呼它們為『無恥的建築』。」

堅定地確立以自身現實為基礎的美學觀，並表達意欲向現實智慧及美學學習的態度。這樣的轉變與確認，其實就是對於前述「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」的積極破解，也是我們此刻在台灣當自思的挑戰。

環顧現今的世界，超大城市與摩天大樓的存在已成為「現代性」的表徵，其原因除了是歷史的發展宿命外，某方面也是在迎合城市間食物鏈競爭的需求，以便在這樣的供需生存競爭中，取得進化論裡所謂「適者／強者生存」的優勢。然而，大多數迅速長成的超大城市，通常非常依賴由上而下控管的單一大系統，以在效率與成果上佔先，多半仍缺乏內在的多元與自發小系統，也因此顯現出單一、秩序與逐步僵化的現象；但是具有多樣化小系統的都市與建築，往往較能因應突發的變化與危機，也就是說單一大系統，不僅僅讓城市面目單調乏味，生活趣味相對單薄，在因應瘟疫、供需失調、污染等問題時，更不如多樣小系統來得靈活、有效果。

日本建築師隈研吾亦有類似看法，他在2010年所寫的書《負建築》裡，先細數1995年以來的一些重大災難，例如阪神淡路大地震、奧姆真理教恐怖主義行動以及紐約的911事件，點出建築本質並非（也無須）代表安全的事實，提醒了現代城市想要暗示能以堅固來與自然對抗的可笑。同時，轉而批判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「私有住宅」政策，如何「反而成為導致家庭不幸的因素」，說明這政策衍伸出來的貸款／私有／保守等問題，如何強化了商品化的住宅買賣遊戲，助其順利能與資本主義／全球化路線的合流同進，並進而導致泡沫經濟／金錢遊戲／建築師品牌化等問題，與因之建築專業完全受控於資本系統之下的種種此刻現象。

甚至，隈研吾認為現代住宅已經淪為權力奪取時的武器了。

這是很真切的批判與反省，但是以大型發展為由，對小型社區或個體建築任意破壞的事情，依

舊屢見不鮮，例如2007年引起年輕世代連結反撲的「樂生療養院」事件、2011年在香港極受矚目的「菜園村」事件，以及近期發生的「師大路夜市」衝突，或是「文林苑王家」事件，都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一般而論，廢墟本來應當如同初生的現象，只是生命過程裡的一個必然面向，會自然而然地循環下去，不會也不該停駐不去。但是，目前我們所見到的許多廢墟現象，卻似乎全然停滯在時空裡，物我兩相忘的霸住不去（既不能死也不得再生）。究其因由，常是肇因於上而下系統的自我僵化，使其失去得以自然替代的生命力，而這尤其容易出現在機制龐大的公部門裡，那樣事不干己的任其凋斃，可算是大系統機制對建築自然生態的謀殺吧！

只能感嘆說：建築有其自然生命，控管者應當懂得適時鬆手吧！